

# “媒介即讯息”:麦克卢汉对媒介本质的现象学直观

范 龙

(华中科技大学 传播学系, 湖北 武汉 430074)

[摘 要] 现象学作为现代西方最主要的哲学思潮之一,具有极其重大的方法论意义,根本上标志着一种以本质直观为核心的哲学方法。麦克卢汉的传播学研究明显体现出“面向事情本身”的现象学精神,其最具代表性的“媒介即讯息”的论点向我们宣示了可被直观把握到的媒介本质,它作为对关于媒介效应的自我意识体验加以现象学的描述和反思的必然结果,实际上正体现了麦克卢汉在有关媒介的认识领域中对于本质直观的成功运用。

[关键词] “媒介即讯息”; 麦克卢汉; 现象学; 本质直观; 反思

## 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 : McLuhan's Phenomenological Intuition on the Universal Medium

Fan Long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430074, China)

**Abstract:** As a scholar who has an important status and profound influence in the history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McLuhan has a reputation which once went through repeated rises and falls. The reviews about him are mostly confined to one kind of speech at will, short of discussions on the level of scientific principle and academic values in the strict sense, no matter they are praises or censures. In these reviews, the knowledge of McLuhan's method of thinking is particularly superficial and confused, flooded with kinds of unrealistic and irresponsible viewpoints based on a narrow field of vision all along. These prejudices seriously hinder the development in depth of McLuhan studies. In view of the present situation, the dissertation proposes that McLuhan's method of thinking may be accurately judged and deeply understood in the phenomenological horizon. The dissertation considers that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hilosophic thoughts in the modern west, phenomenology is of extremely great methodological significance, and can be radically regarded as one kind of philosophic method which takes universal intuition as its core. Through the explanation of McLuhan's texts, the dissertation discovers that McLuhan'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obviously embodies the phenomenological

spirit of facing matter itself, and as the inevitable result of phenomenological description and reflection on the self-consciousness about the effects of medium, his most representative argument that 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 declares the essence of medium which can be grasped directly and in fact displays the successful application of universal intuition in medium understanding. For the above reasons, the dissertation points out that in a broad sense, McLuhan can be regarded as a phenomenologist who did not participate in the movement of phenomenology subjectively but really follows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phenomenology and utilizes the basic methods of phenomenology objectively in his academic practice, and there is a remarkable relationship between McLuhan'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henomenological method.

**Key words:** 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 McLuhan; phenomenology; universal intuition; self-reflection

在《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以下简称《理解媒介》)一书中,加拿大传播学家麦克卢汉提出了一个极负盛名的论点——“媒介即讯息”。一般认为,所谓“媒介即讯息”,无非是指媒介作为信息的载体,其影响之大甚至超过它所传播的内容。然而,对于这样一句言简意赅的警句,我们是不是仅作如是观就足够了?笔者认为,如果从现象学的角度来考察,“媒介即讯息”就不再只是对媒介形式本身的重要性的简单强调,而可以从更深刻的层面上加以理解。

现象学作为现代西方最重要的哲学思潮之一,向来以其独到的方法论著称于世。德国哲学家胡塞尔指出:“现象学:它标志着一门科学,一种诸科学学科之间的联系;但现象学同时并且首先标志着一种方法和态度:特殊的哲学思维态度和特殊的哲学方法。”<sup>[1]24</sup>而这种方法,一般认为就是现象学的“本质直观”或曰“本质还原”。

我们知道,胡塞尔的毕生夙愿就是将哲学建设成为一门“严格的科学”(胡塞尔称之为“现象学”),以为各种具体科学奠定绝对可靠的认识论基础。因此在他看来,哲学家首先需要追问认识是如何成为可能的,而这一追问的落脚点即在于确认思维具有无可怀疑的绝对被给予性。在这里,胡塞尔对笛卡儿哲学有所借鉴。众所周知,法国哲学家笛卡儿提出“我思故我在”意在说明:我可以怀疑一切,但不能怀疑我的“怀疑”,因为当我怀疑我的“怀疑”时,我就已经在怀疑了。显然,笛卡儿的“我思”所具有的这种自我明证性正是胡塞尔所需要的:“笛卡儿的怀疑考察方式为我们提供了起点:在体验的过程中和对体验的素朴反思中,思维和体验的存在是无可怀疑的;直观地直接把握和获得思维就已经是一种认识,诸思维是最初的绝对被给予性”<sup>[1]18</sup>。也就是说,我们在进行思维(这里的“思维”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包括一切知觉、体验、认识、想象等等,即现象学所谓的“现象”,也就是呈现于这些思维中的意识现象)的同时,这个思维本身可以作为一个直接给予我们的对象而被我们确定无疑地把握到。譬如,我看见远处有一棵树,不管远处是否真有这棵树,我的确看见了这棵树,即便这是我的幻觉,这个幻觉本身也是真实的。这里实际上存在着两个层次的“看”。第一层“看”,看的是树,由于这棵树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因此是值得怀疑的;第二层“看”,看的是这个“看”本身,由于这个“看”本身正在进行,因此是毋庸置疑的。可以说,第一层“看”旨在对那些外在于我的自在之物作出某种超越的判断,缺乏明证性的认识论基础;而第二层“看”则完全将自己限制在内在于我的思维直观中,“没有表述其他什么,没有超越自身去意指什么”<sup>[1]10</sup>,它所获得的认识

的明晰性在任何超越的科学都无法达到的。为此,胡塞尔主张放弃一切有关外部世界存在的设定,同时相应的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对于世界的各种看法统统置入“括号”,存而不论。可以说,通过现象学的这种“悬搁”,指向外在的超越的认识被还原为内在思维的直观的认识,而这种狭义的“现象学还原”(广义的“现象学还原”还包括下面将要提到的“本质还原”和“先验还原”)的意义就在于,它在最基础的层面上完成了清除研究对象中非明证性因素的工作,强调对纯粹的意识现象加以无成见、无预设的直接把握,围绕“直观”这一中心概念确立了被称为“全部原理之原理”的现象学“第一方法原则”：“任何原初地给予的直观都是认识的合法源泉,一切在直观中原初地(即所谓在其自身的现实性中)呈现给我们的东西,只能按照它自身被给予的那样,而且也只能在它自身在此被给予的界限之内被接受”<sup>[12]84</sup>。

胡塞尔认为,借助狭义的“现象学还原”,我们已能看清认识的源头所在;但由于我们的认识总要追求某种普遍的有效性,故为了最终解决认识的可能性问题,还必须使现象学进一步上升为一门“本质科学”,以阐明一般之物的直观性质。遗憾的是,在这个问题上,笛卡儿式的“我思”已经无能为力了,因为它只是一个孤零零的思维本身,虽然具有作为认识之起点的自我明证性,但却无法与客体世界相沟通,更谈不上将直观拓展为一种本质认识了。因此,在充分吸收“我思”精髓的同时,胡塞尔认为有必要“通过适当的改造来利用它”<sup>[11]29</sup>。而这种“改造”,就是把它与“意向性”结合起来。

所谓“意向性”(这个概念由布伦塔诺最早提出),是指一切意识活动的一个基本特点,即它们都具有意指功能;换句话说,我们的任何意识无一例外地是关于某个对象的认识,没有哪个意识是完全无对象的。在胡塞尔看来,所有意识活动均可被视为意向性活动,其所指向的就是意向对象,它产生于意向活动对感觉材料的“激活”和“统握”中。譬如,当我看一张桌子时,这张桌子的颜色、形状、尺寸等各种构成因素都进入我的意向活动之中,结果我只看到这张桌子本身。也就是说,我并没有去拼凑感觉材料,我所看到的就是直接呈现给我的意向对象——当然,假如没有感觉材料的参与,这个意向对象根本无法呈现出来。在这里,胡塞尔区分了两种“内在”:一种是“实项的”内在,即为意向活动奠基的感觉材料;另一种是“意向的”内在,即通过意向活动对感觉材料的处理而形成的意向对象。相对于前者而言,后者是超越的,但由于它并未逸出意识之外,因此这种超越仍然是内在的,是可以为现象学利用的一种合法的超越,而不是必须为现象学排斥的那种外在的、非法的超越。

所以说在胡塞尔这里,笛卡儿的那个干瘪空洞的“我思”被赋予了某种“生育力”,借助意向性,它获得了自己的意向对象,从而突破了原先狭隘的内在性领域。至此,胡塞尔实际上指明了一般性被直接给予的途径,也就是说,“本质直观”的可能性已经被暗示出来了。由于作为一种超越之物,意向对象在自我思维的内在性中具有相当的可塑性,“只要我们考虑到意向性的结构,那么这个结构构成的是个别的对象还是一般的对象就没有泾渭分明的或逻辑上不可逾越的界限”<sup>[3]70</sup>,故胡塞尔认为,在我们的思维中并存着两种直观:经验直观和本质直观。前者是一种感性直观,针对的是个体对象;后者是一种理性直观,针对的是范畴对象。而前者向后者的过渡,在他看来是可以通过我们转变自身目光的“朝向”而实现的。胡塞尔举例说:“我们看一下一般之物的被给予性情况,这种情况就是:一个纯粹内在的一般性意识根据被观察的和自身被给予的个别性构造自身。我具有关于红的一个或几个个别直观,我抓住纯粹的内在,我关注现象学的还原。我截断红在被超越地统摄时所意味着的一切,如意味着我桌上的一张吸墨纸的红等等,现在我纯粹直观地完成一般的红或特殊的红的思想的意义,即从这个红或那个红中直观出同一的一般之物;现在个别性本身不再被意指,被意指的不再是这个红或那个红,而是一般的红。”<sup>[11]49-50</sup>由此可见,本质直观虽以经验直观为基础,但它一旦发生,就相对独立于经验直观了。譬如在上述例子中,通过某个或某些具体的红而显现出来的“红本身”便具有了不依赖于那个或那些具体的红而存在的某种自在性,具有了“先天的、绝对普遍的有效性”<sup>[4]234</sup>。据此而论,现象学所理解的“本质”,就是一种作为有着“绝然的明证

性”的观念之物的纯粹先验本质——在胡塞尔那里,它被称为“艾多斯”。

本质直观由于回答了认识论的基本问题,因此在现象学家眼中有着无可取代的重要地位。可以说,即便在进一步提出了“先验直观”(即“先验还原”)之后,胡塞尔也未放弃本质直观;而随着其晚期的先验现象学思想日益遭到质疑,本质直观更成为了被整个现象学运动所普遍认可和接受的唯一方法。正如胡塞尔在被美国哲学家施皮格伯格称为“最接近于现象学的宣言”的《哲学与现象学研究年鉴》创刊号的前言中所声明的:“将各个编者联合在一起并且甚至在所有未来的合作者那里都应当成为前设的东西,不应是一个学院系统,而毋宁说是一个共同的信念:只有通过向直观的原本源泉以及在此源泉中汲取的本质洞察的回复,哲学的伟大传统才能根据概念和问题而得到运用,只有通过这一途径,概念才能得到直观的澄清,问题才能在直观的基础上得到新的提出,尔后也才能得到原则上的解决。”<sup>[5]6-7</sup>

## 二

众所周知,麦克卢汉的传播学研究从一开始就表现出特立独行的风格。他曾明确表示:“我不死守任何一种理论——既不死守我自己的,也不死守别人的。”<sup>[6]12</sup>又说:“我以崭新的眼光重新考察延伸人体的媒介,几乎没有接受传统智慧中看待它们的任何观点。”<sup>[7]23</sup>就传播学而言,这些“理论”和“观点”,主要是指在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都占据主流地位的实证学派的研究模式与成果。麦克卢汉对于它们的排斥,既表现了拒绝先入之见的实事性态度,更是对所谓“超越之物”(即那种外在的、非法的超越)的“悬搁”。

胡塞尔认为,“存在”应该从两种意义上被理解:其一是实在意义上的作为事物的“存在”,其二是现象学意义上的作为体验的“存在”。前者是实证科学的本体论对象,可以通过“射映”的方式而被认识;后者是哲学的本体论对象,只能借助“直观”而被内在地感知到。在传播学领域中,如果说传统的实证研究关注的是媒介效果的可度量的实在存在;那么,麦克卢汉则在他的研究中完全清除了这种超越了直接被给予性的诉求,而将目光投向了“内在之物”,即其自身关于媒介效应的纯粹意识的存在。于是,通过狭义的现象学还原,“直观”成为了麦克卢汉把握媒介现象的基本方式。他在论及书面语对口语的改造时写道:“由字母肇始的口头语言中的体态、视像和声音的分离,开始达到新的强度……字母表将口语的视像成分作为最重要的成分保留在书面语之中,将口语中其他所有的感官成分转换为书面形态。这有助于说明,为何木刻和照片在偏重文字的世界中受到非常热烈的欢迎。这些形式提供了一个包括姿势和富有戏剧性的体态在内的世界,这些东西在书面语中必然是略而不载的。”<sup>[7]204</sup>而他在谈到电话不同于收音机的特性时又说:“许多人打电话时感到有一种‘比比划划’的冲动。这一事实与电话这种媒介的下述特性有关:它要求我们的感官和官能参与其间。和收音机不同,它不能用作背景,因为电话提供一种很弱的听觉形象,我们借用全部感官去强化并补足这一形象……为什么电话会造成一种强烈的寂寞感?为什么我们明知公用电话的响声与己无关时,仍然觉得有什么东西强制我们去接电话?为什么舞台上的电话一响就立刻造成观众的紧张情绪?以上所有问题,可以这样简单回答:电话是一种要求参与的形式,它要求一位同伴。它确实不像收音机那样具有背景工具的职能。”<sup>[7]330</sup>在其代表作《理解媒介》一书中,此类论述如此之多,证明麦克卢汉确如他自己所言:“我信奉观察,我只进行观察。”<sup>[6]12</sup>而事实上,这种对于“看”的掌握与运用,正是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所认为的进入现象学之路的第一步。

据说《理解媒介》尚未出版时,该书的一位编辑就曾惊呼:这本书百分之七十五的内容是新的!而作为这种“全新思想探索的完美结局”<sup>[6]152</sup>,麦克卢汉最终提出了“媒介即讯息”的骇俗之论。他说:“电影的诞生使我们超越了机械论,转入了发展和有机联系的世界。仅仅靠加快机械的速度,电

影把我们带入了创新的外形和结构世界。电影媒介的讯息,是从线形连接过渡到外形轮廓……当电的速度进一步取代机械的电影序列时,结构和媒介的力的线条变得鲜明和清晰。我们又回到无所不包的整体形象……在电影出现的时刻,立体派艺术出现了……立体派不表现画布上的第三维这一专门的幻象,而是表现各种平面的相互作用,表现各种模式、光线、质感的矛盾或剧烈冲突。它使观画者身临其境,从而充分把握作品传达的讯息……换言之,立体派在两维平面上画出客体的里、外、上、下、前、后等各个侧面。它放弃了透视的幻觉,偏好对整体的迅疾的感性知觉。它抓住迅疾的整体知觉,猛然宣告:媒介即是讯息。<sup>[17]38-39</sup>

显然,在上述文字中,麦克卢汉选取电影和绘画这两种媒介作为考察的对象,通过对自我意识体验的描述分析(需要说明的是,在表述方式上,与现象学的直观原则相适应的是现象学的“描述”。如果说现象学的还原保障了一个严格的现象学研究领域,那么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现象学的描述则可以充分自觉地维护这一领域中一切方面和因素的纯粹性并对之加以具体分析。显然,这种从根本上与一般作为事实性的陈述和再演的描述方法相区别的描述的特点,在于它将自己完全限定在直观的直接证据之上,而在始终忠实于现象的同时,它又积极引导描述者不断广泛、深入地接触现象本身,从而表现出一种揭示我们的经验世界之丰富性的坚决努力),发现各种媒介都为我们提供了互不相同的感知经验。事实难道不是如此吗?我们常说语言是存在的家,意即语言在每个人的经验世界中都发挥着基础性的构成作用。而实际上,语言就是一种最基本的媒介。正如麦克卢汉援引德国教育学家洪堡的话所指出的:“人与客体的生活,主要是按照语言对他呈现的形象来生活的。事实上,因为他的感觉和行动依赖感知,所以我们还可以说,他完全是按照那样的形象生活的。人从自己的身上开发出了语言。凭借同样的过程,他又使自己落入陷阱。每一种语言都在它所属的人周围画上了一个定身的魔圈。这个魔圈使人无路可逃,除非是跳出去进入另一个魔圈。”<sup>[8]190</sup>又譬如,随着计算机网络媒介的发展,我们不仅在信息传播的“量”与“质”上进入了一个全新境界,更在所谓的“赛博空间”中感受到“虚拟实在”的存在。此外,我们当然还有很多类似的例子,但似乎不必一一列举了,因为凭借对个别媒介的“本质直观”,麦克卢汉已然明确地告诉世人:媒介构成了我们生存其间的知觉环境,它在本质上就是向我们呈现着的世界。

需要指出的是,在现象学看来,所谓“世界”,就是我们所能感知到的世界,亦即在我们的直观思维中显现出来的世界。因此,作为显现之物,媒介所构成的世界也便是世界本身,此外别无另一个世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麦克卢汉提出:“媒介是一种‘使事情所以然’的动因,而不是‘使人知其然’的动因”<sup>[8]266</sup>。这即是说,媒介不是通向世界的桥梁,媒介构成了世界本身;世界不是借由媒介来表现,世界就存在于媒介中;人不是透过媒介去认识世界,人就生活在媒介的世界里。当然,如前所述,这里反复提到的“世界”,是一个作为意识体验而存在的现象世界。媒介的这种“本质”,也是现象学意义上的纯粹观念性的“艾多斯”。

### 三

英国文化学家威廉斯曾经不无偏颇地指出,按照“媒介即讯息”这一说法来推论,媒介由谁控制或使用以及控制者、使用者试图插入什么内容,对于传播效果似乎都是无关紧要的,人们尽可以忘却政治和文化上的辩论,而让技术自行运作<sup>[9]126-128</sup>。实际上,“媒介即讯息”并不意味着对媒介内容的价值和意义的抹杀。麦克卢汉说过:“媒介是终极的讯息……我强调媒介是讯息,而不说内容是讯息,这不是说,内容没有扮演角色——那只是说,它扮演的是配角。”<sup>[8]373</sup>在他看来,媒介内容只能触及人的意识层面的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媒介形式则可塑造人的潜意识层面的思维习惯和感知模式。两者各有其功效,只是作用于不同的领域。当然,前者产生的是具体、特定的传播“效果”,而后者产生的是

一般、普遍的传播“效应”。相比之下,后者较前者对人们有着更为深刻和根本的影响——这正是麦克卢汉认为“媒介成分和内容的研究绝对不可能揭示媒介影响的动力学”<sup>[8]276</sup>的原因。

然而有意思的是,对于媒介形式的这种深刻而根本的影响,人们反倒容易忽视。麦克卢汉曾在谈到他致力于研究媒介形式的动机时说:“有效的媒介研究不仅是要处理媒介的内容,而且要对付媒介本身。以前人们对媒介的心理和社会后果意识不到,几乎任何一种传统的言论都可以说明这一点……在过去的3500年里,西方世界的社会观察家对媒介的影响始终都忽视了,无论是言语、文字、印刷术、摄影术、广播还是电视,都忽视了。即使到了今天的电子时代,也没有多少迹象表明,学者们会修正这种置之不理的鸵鸟政策的传统立场。”<sup>[8]230,360</sup>事实上,所以会出现上述状况,正是因为媒介形式的巨大潜意识影响已令长期浸淫于其中的人们变得麻木了——麦克卢汉将这种状态称为“自我催眠”的“那喀索斯综合症”,认为“凭借这种综合症,人把技术的心理和社会影响维持在无意识的水平,就像鱼对水的存在浑然不觉一样”<sup>[8]360</sup>。

的确,水之于鱼——正如媒介之于我们——是一种环境,而“环境的首要特征是隐而不显、难以察觉的……没有一种环境是能够轻易感知得到的,原因很简单,它浸透了我的注意力”<sup>[8]412-413</sup>。胡塞尔曾经指出,现象学所以代表了不同于一切传统的自然态度的真正的哲学态度,乃是因为它坚持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向,要求通过认识者对其认识过程的自身沉思而将目光从直向可把握的外在性和对象性,转溯到原初被给予的内在性和本己性上,从而对已往思考过的东西加以“回问”。显然,在这一点上,麦克卢汉表现出了实现自我意识体验的“课题化”(胡塞尔的“课题”概念,是指自我对其对象的“清醒地意识到”,即所谓“课题性的生活就是作为自我清醒地生活”<sup>[4]454</sup>)而对之加以现象学反思的高度自觉——以一种“反思着的自我成为了它的纯粹意识生活的无兴趣的旁观者”<sup>[4]525</sup>的超脱姿态,他在现象学的描述分析中使隐匿于传统知识里的某些“实事”得以澄明地显现出来,从而直观地获取了关于媒介本质的深刻洞见。德国哲学家施密茨曾说:“现象学家试图揭示性地和理解性地接近无意识的生活体验,从自己的信念中,从许多人甚至所有人的共同信念中剖析出尚未把握的东西。”<sup>[10]11</sup>在笔者看来,“媒介即讯息”的提出,表明麦克卢汉通过运用现象学的基本方法,已然在有关媒介的认识领域内达到了这一目的。

法国哲学家索莫认为,现象学具有一种“启蒙哲学”的特征,它检讨那些不为人知的偏见和貌似的生活自明性;通过现象学的考察,许多不言而喻的东西成为可疑的。应该说,在麦克卢汉以前,媒介仅被视为信息的容器,受到关注的只是它所承载的内容;而麦克卢汉的媒介学说冲破了这种教条的束缚,对传播学研究来说的确是具有“去蔽”的“启蒙”意义的。如果说胡塞尔通过创立现象学方法而启动了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向,那么,麦克卢汉则在对现象学方法的具体运用中开辟了所谓“媒介本体论”(即将“媒介”作为一个独立的事物来加以考察)的研究路径,从而也引发了传播学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或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美国传播学家切特罗姆作出了如下断言:“作为最先进的传播理论家,对麦克卢汉必须历史地给以评价,必须就他对于传播媒介的现状和未来的理解所作贡献的持续现实意义做出判定。”<sup>[11]159</sup>

### [参 考 文 献]

- [1] 埃德蒙德·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倪梁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E. Husserl, *The Idea of Phenomenology*, trans. by Ni Liangkang,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1986.]
- [2] 埃德蒙德·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李幼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E. Husserl, *Reasonable Argument of Pure Phenomenology*, trans. by Li Youzheng,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92.]
- [3] 张祥龙:《朝向事情本身——现象学导论七讲》,北京:团结出版社,2003年。[Zhang Xianglong, *Facing Matter Itself: Seven Lectures on Introduction to Phenomenology*, Beijing: Tuanjie Press, 2003.]

- [ 4 ] 倪梁康:《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Ni Liangkang,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Husserl's Phenomenological Concepts*, Beijing: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99.]
- [ 5 ] 倪梁康:《面对实事本身——现象学经典文选》,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年。[Ni Liangkang, *Facing Matter Itself: Classical Selections of Phenomenological Texts*, Beijing:Oriental Press, 2000.]
- [ 6 ] 菲利普·马尔尚:《麦克卢汉:媒介及信使》,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P. Marchand, *Marshall McLuhan: The Medium and the Messenger*, trans. by He Daokuan, Beijing: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03.]
- [ 7 ] 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M. McLuhan, *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 trans. by He Daokuan,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0.]
- [ 8 ] 埃里克·麦克卢汉、弗兰克·秦格龙:《麦克卢汉精粹》,何道宽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E. McLuhan & F. Zingrone, *Essential McLuhan*, trans. by He Daokuan,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2000.]
- [ 9 ] R. Williams, *Television: Technology and Cultural Form*, London: Wm. Collins & Co. Ltd., 1974.
- [ 10 ] 赫尔曼·施密茨:《新现象学》,庞学铨、李张林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H. Schmitz, *New Phenomenology*, trans. by Pang Xuequan & Li Zhanglin,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1997.]
- [ 11 ] 丹尼尔·切特罗姆:《传播媒介与美国人的思想——从莫尔斯到麦克卢汉》,黄静生、黄艾禾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D. Czitrom, *Media and the American Mind: From Morse to McLuhan*, trans. by Huang Jingsheng & Huang Aihe, Beijing: Publishing House of Chinese Broadcast and Television, 1991.]

邮发代号:国内 32 - 35

国际:BM 372

## 欢迎订阅 2008 年《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是由教育部主管、浙江大学主办的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刊物,是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教育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名刊工程”入选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全国“双十佳”社科学报、全国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历年来源期刊,并被国际重要检索机构美国《剑桥科学文摘》(CSA)收录。《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是全国最先采用“同行专家双向匿名审稿制”的人文社科类学术期刊之一(1998),在学界享有较高声誉。《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为双月刊(200页),大16开本,逢单月10日出版,全年共6期。

地址:杭州市天目山路148号

网址:<http://www.journals.zju.edu.cn>

电话:0571-88273210、88925616

邮编:310028

电子邮箱:zdxw\_w@zju.edu.cn

传真:0571-88273210